

师道师说——全景展示大师的学术生活史

师道师说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邓小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師道師說

中國文化書院九秩導師文集

邓广铭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邓小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 邓广铭卷 / 邓广铭 著; 邓小南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1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ISBN 978-7-5060-5985-5

I. ①师… II. ①邓… ②邓… III. ①邓广铭 (1907~1998)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474 号

师道师说: 邓广铭卷

(SHIDAO SHISHUO: DENG GUANGMING JUAN)

作 者: 邓广铭

编 者: 邓小南

责任编辑: 夏旭东 高 冉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39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985-5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 编：王守常
副主编：李中华 魏常海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守常	方立天	乐黛云	宁 可
刘梦溪	汤一介	孙长江	杜维明	杨 辛
李中华	李学勤	李泽厚	吴良镛	余敦康
张立文	陈越光	林 娅	欧阳中石	庞 朴
侯仁之	谢 龙	戴 逸	魏常海	

组织编辑：中国文化书院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总序二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用“三五之变”来讲天运变化，也可以用来比附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那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上下两个五十年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大变革。在第一个五十年的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从“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阵痛，走向融合西方思想文化而从容探索建构中国式的思想文化范式的历程，造就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一批颇具哲学思想原创性的著作纷至展现，他们走出王国维的以西方哲学概念诠释中国哲学观念的困局。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充实了传统中国史学的纪传体叙事模式，以实证田野调查手段，让五千年古史鲜活起来。在文学领域，他们以人文主义融合了传统中国诗词歌赋的情感创造出新时代文学作品。在训诂考据文字学方面，他们用新的研究方法给这最具传统的领域增添绚丽色彩。总而言之，那三十年几乎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诚如梁启超所言：“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治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可以说今天的学人如不能承继这份学术遗产的话，是无法迈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堂奥。

后五十年代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中国史上的巨变，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结束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其后三十年，曾经引导中国思想剧变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由学理向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思想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在理论学术界，“左”倾教条主义得以大肆横行，政治批判取代了严肃的学理研究，所有学术话语都转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语言。从而造成学术理论思想创见的贫乏，学术研究的发展由繁荣走向枯

稿。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除在古籍史料整理上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以外，在学术理论、学术方法方面的发展则乏善可陈。待到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思想学术研究放开，思想界也开始了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成因的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再次如潮涌来，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译为中文，成为最时尚的读物，演为二十世纪的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此后又有多年的思想学术的低潮，不过那寂寞春夏还是孕育了学术思想的种子，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学术思想的成果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十世纪去了，中国文化书院的一部分导师也随之仙逝。他们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这套丛书选编了中国文化书院九十岁以上的导师的最具代表性著作和他们的亲友及学生对先生的追忆而集结成书。不为歌功颂德，只为记住我们自己的老师！当然我也企盼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上，也应有属于他们的一座纪念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为序。

后学王守常谨记

2011年12月22日深夜

自传（代序）

我，邓广铭，于1907年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这县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在清代近270年的时间内，临邑县没有一个进士及第的人，也没有因其有一技之长而闻名于世的人。其文化之落后可见一斑。

我从6岁起进入村塾读书，塾师是一位秀才。那时恰为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也已缓慢地传布到我们那村塾里。但读教科书只是我们的“余事”，正规的读物，却还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之类。我家的一部《凤洲纲鉴》，也被塾师借去阅读，并从中选取一些篇段向我们讲说。我们也曾抄写、阅读和背诵过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文章。到1920年暑假后我考进县城中的高等小学为止，我在村塾中共待了七年半的时间。在此期内，我备受塾师赞赏，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了了”的学童。

在这七年半的学习生涯中，虽非全无所获，然却只是从高头讲章上、从只会做八股文的塾师的讲解中去理解《四书》、《五经》和《纲鉴》、古文等等，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

总结我在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三年的经历，似乎也谈不到有何值得称述的收获。校内只有一位从外县请来的教员水平稍高，据闻他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一位高才生。他当时居然买了一部《胡适文存》，并把它借与我。我读过之后，对所谓新文化运动仍感茫然摸不着头脑，然而对其中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则颇感兴趣（因为我读过《诗经》）；另外，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了地位。

1923年夏，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在济南虽不算最高学府，但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来看，在当地各校中却是居于首位的。校长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他倡导学生多多阅读上海和北京两地先后创刊的几种报刊杂志，例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等等；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这时校内高年级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经销北京的北新书局、未名社、朴社和上海的创造社所出版的各种新书。我在进入二年级后也成为这个社的成员，每周三次在课外去服务两小时。这使我有机会对南北各地所出新书恣意浏览。其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在译品方面则是鲁迅所译日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还有《沉钟》上所载杨晦译出的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的一篇《导言》；在新印的古籍方面则有顾颉刚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几种《考信录》）。是这一期间，才使我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崔东壁的几种《考信录》使我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为，而罗曼·罗兰一篇短短的《悲多芬传·导言》，也使我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这对我后来的治学道路，即使说不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多多少少总还是有一些导向作用的。

整个20年代，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北洋军阀互相厮杀的时代。不论军阀中的哪一派当权，总都不肯让知识分子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学生，最年长的也不过弱冠或方冠之年，根本也还没有参政议政的要求，原应不会触犯到他们，事实却又不然。因为，他们虽都是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却偏偏都要制定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当我还未读完前期师范（相当于初中）时，奉系军阀张宗昌取代了直系军阀而成为山东省的统治者。他首先换用清朝末年的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不久便又以“赤化嫌疑”为罪名而撤掉了王祝晨的第一师范校长职务，改用一个头脑冬烘的李某当校长。李某到校后即辞退了一些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改用一些举人秀才之类的乡曲之士，其

他课程的教师也多有更换。学生们在上课时深感腐臭之气不可耐，1927年秋，我们便举行了全校学生罢课，明确提出驱逐校长和某些教员的口号。教育厅派员到校视察，该员不准学生代表申诉理由，便厉声训斥：“你们的行动，太使督办（指张宗昌，其名銜为山东军事督办）的脸面难看了。”过了一周，处分宣布了，把每个年级的级长一律开除，迫令其余学生复课。在开除学籍的布告上，我是名列榜首的一人。这时我正在读后期师范（相当于高中）二年级，年20周岁。

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四年半，这时期我竟成了一个醉心于北京大学的人，总希望在师范毕业后能再考入北大读书。被从师范开除之后，我立即陷入走投无路的烦闷之中。1930年秋，我转来北平，一方面在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一方面也插入一家私立中学的毕业班，以求取得一张文凭，便于报考大学。翌年报考北大未被录取，我便考进私立辅仁大学的英语系。

在辅仁读书的一年内，适逢周作人应代理校长沈兼士之邀，到校作六周的学术讲演，我逐讲为之做了详细记录，1932年印行，书名定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此期间我还与英语系二年级的同学萧乾相识，其后一度成为好友。

1932年夏，我二次报考北大，被录取，进入了史学系。这时的北京大学，历经安国大元帅张作霖与他任用的校长刘哲的肆意摧残，又继之以李石曾为首的北平大学的横行吞并之后，于1930年得以重新恢复为拥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独立大学。文学院以胡适为院长，史学系则据闻旧主任朱希祖去职，新主任由傅斯年暂代，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名家累累，颇极一时之盛。

我读三年级时，与同班傅乐焕、张公量共同为天津《益世报》主编了《读书周刊》（名义上是以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为主编）。读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习作”，写成了一本《陈龙川传》，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此传至1943年由重庆的一家出版社印行问世。

我毕业后即留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以一半时间整理所中所藏拓片（与罗尔纲合作），另一半时间则帮助钱穆先生整理校点他为讲

授中国通史而搜辑的一些资料，亦即后来他所写《国史大纲》的《长编》。在这一年内，我还为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编写《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资助费用作准备，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在《国闻周报》刊出，获得陈寅恪、夏承焘、胡适之诸先生的好评，使我申请资助的事得以顺利通过。在1937年4月某日的《申报》上刊出会议的决定，自1937年7月至翌年6月，共资助我一千元整。

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北平即为日寇所占领，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未能确定，故暂定只许正副教授南迁，讲师、助教暂留北平或家乡待命。这时沙滩周围的北京大学已被日寇接管，我自不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读书作业，而北平图书馆的经费却因全由中华教育基金会拨付，在珍珠港事件前，日美邦交未生变化，故日寇对北图的一切均不干预。我随即转而以北图作为我的研究基地。《辛谱》和《辛词笺注》一年未能完成，我又向基金会申请延长了一年。

北大文科研究所原由胡适先生任所长，北大迁至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先生任所长，并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导师。1937年秋我应北大之召，自天津遵海而南，由沪、港、越南绕道抵昆明，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这大概是因为为我拟定的月薪为150元，高于一般助教之故）。这时文研所设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内，师生合住于一幢三层的小楼内。用餐则师生分在两室。从1939年秋至1940年夏，我得日夕亲陈先生的警教，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他每次上课，我都去旁听，而在每日三餐的饭桌上，更得饫闻陈先生的高谈阔论（大都是属于中国近代史和学术界的一些掌故）。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我到昆明不久，适逢新印出的《宋会要辑稿》因避免在沪日人的抢购，大量寄往昆明，对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出售，然而也还等于我的全部月薪。傅先生却要我非买不可，遂即买了一部。傅先生总是千方百计要我把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在昆明期间，与我来往最勤的，是一位“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先生。当时我写的一篇

《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

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傅先生决定把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他指令我也随同迁徙。因为，当时迁移后方的大学，都未能把图书运往后方，而史语所却把全部图书迁去，成为后方唯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史语所把图书迁往四川，我留在昆明势必无法再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我就于1940年底迁到四川的李庄，但编制仍旧属于北大的文研所。在李庄共待了二年又半，写成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和未能脱稿的《〈宋史刑法志〉考证》。

1942年春我转往重庆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一个名叫《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暑期内，我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的史地系聘为副教授，担任全校文理两院新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还有专属史地系的几门课程。其时我正好写成一篇文章《辛稼轩交游考》，遂交《复旦学报》复刊第一期刊出。因此文采摭较广，解决了历来研究辛稼轩者所未能解决的大量问题，给予复旦文史诸系的教授们以深刻印象。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央博物院于1944年秋在重庆举行文物展览，我带领史地系的高年级学生前往参观，曾昭燏先生亲自解说，李济先生又作了总结报告，使学生受益极大。应学生请求，我又请到傅斯年、郭沫若两先生作了学术讲演。这使得史地系的学生对于我与学术界的有了良好印象。我在复旦所讲授的中国通史等课程，也受到学生欢迎。基此种种，到1945年我就被提升为教授了。

1944年春，我应重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一本《岳飞》，冬季完稿交卷，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

日寇投降后，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发表声明，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未回国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先生约我相见，告诉我：“北大决定请你回史学系教课。”我当即答应。到1946年5月初，他为我买好机票，要我与她相继飞返北平，帮助他办理校长室的一些事务。我于1946年5月7日抵北平，从8日起，即成为北大校长办公室的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胡适校长于8月到校，我的这一兼职依然未得

解除。而且，从这年10月起，天津的《大公报》邀请胡先生为其主编《文史周刊》，我从此又兼任了这一刊物的执行编辑。而在北大于10月中旬正式上课之后，我所担任的课程亦未因此而稍有轻减。

1948年夏，经史学系的系务会议决定，史学系的新生不再必修一年制的《中国通史》，而把原分七段的各种断代史合并为四大段，即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清（至1840年之鸦片战争止）史，由学生依次修习。我每年除担任其他系科之一年制中国通史外，每年的上学期即担任隋唐五代宋辽金史之讲授任务。

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51年我参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并从这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近代史研究所合力为天津《大公报》编辑《史学周刊》，我代表北大史学系参与其事。

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燕京之文理学院各系均与北大合并，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原址，史学系改称历史系，由翦伯赞任系主任，周一良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53年《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办《史学》专刊，由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与近代史所合力编辑，我仍参与其事。

1954年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反革命文艺思想”，学校停课甚久。我于其间把《岳飞》作了大幅度修改，改名《岳飞传》，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30年代内编写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年谱》，也是在1957年首次印行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学校停课几个月搞运动，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因被列入“右派”或“补充右派”而戴上帽子，自此一蹶不振。

1958年我参加了双反运动（后改为拔白旗运动），历史系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我这面白旗。结局是宣布不许我再上课。

这样那样的运动虽相连不断，但《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迄未停止。而且，从1958年以后，即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编辑之责了。专刊的领导仍为范文澜、翦伯赞二人，而执行编辑则为我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实际上以我为此四人小组的组长。1959年自郭沫

若、翦伯赞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开始，在《史学》上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一场讨论，影响及于全国。后因陈伯达的干预而中止。

1960—1961年，我参加了周扬领导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各次讨论会，翦伯赞在会上接受了编写《中国史纲要》的任务。其后我即以全力编写该书的宋辽金史部分，1962年初，于苏州南林饭店进行讨论，是年冬，《纲要》之宋辽金与元明清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我又恢复了为学生讲课的资格。这年10月，因在《史学》上刊出了孙达人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继而引起了一场讨论。我与诸编辑原皆倾向于赞成让步政策论，但报社中人士却闻悉领导的意图，是要否定让步政策说。这场讨论并未持续太久。

自1964年秋到1965年夏，我与一些同事下乡到顺义县天竺公社的楼台村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1965年秋，因姚文元在上海报纸上刊出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遂在京沪各地逐步开展了批吴晗的运动。我完全不知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虽也写了批判文章，但调门很低。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了“陆平、宋硕、彭珮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的大字报，于6月1日经《人民日报》转载，遂又把对吴晗的批判拓展为一场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以后，全国的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我则被定为反动权威，成为革命的对象。自该年9月开始，我或在北大的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松绑”，允准我去中华书局参加标点《宋史》的工作，但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不久即将我押解回校，进行批斗。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我和北大大多数教职工一起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的劳动，1971年5月初我被遣返学校。其大批人马则是在林彪于“九一三”演出了叛国事件后才全部遣返的。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接见他时，据说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派人与我商洽，要我

把旧作《王安石》小册子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当年出版，以利销行。我却以为旧作必须进行大量修改，只扩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绝难了事。其后因受到“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诸闹剧的干扰，到1975年，改写之《王安石》方得出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曾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未满一届而止。经我的倡议，为“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自1978年以来，我又对1954年改写过的《岳飞传》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

因为从美国友人田浩教授处传来南宋刻本《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缩微本，我得据以写出《三十卷本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一文，并即对三十卷本的《陈龙川集》进行了校点和增补，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印行了增订本《陈亮集》。

1989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与张希清合力点校的司马光《涑水记闻》。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又对《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进行修改补充，后一种已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估计不久可能出版。《稼轩年谱》的订补工作则尚未毕事。对辛稼轩的诗文，已经请人作了注释，尚有待于审阅定稿。

1992年12月10日写于北大朗润园第十公寓

(原载《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目 录

总序一	1
总序二	3
自 传（代序）	3
回顾前瞻	
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	3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8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21
《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	30
学林忆往	
我和北大	35
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	38
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42
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	61
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89
追怀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	95
我与《光明日报·史学》	100
谱传序言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	107
《韩世忠年谱》序例	118
《岳飞》序	121
《陈龙川传》自序	126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	131